

● 语言文化与国家战略

翻译能力建构与中译外人才培养*

吴 贲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在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语境中, 世界关注中国, 中国走向世界,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格局。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求不断加大, 如何能有效培养本土翻译人才, 更好地向世界表达中国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中国文化需要什么样的本土翻译人才来完成对外译介的使命, 他们必须具备哪些必要翻译能力, 如何提高中译外人才的培养质量? 本文结合中国文化外译现状, 立足多要素翻译能力研究模式, 剖析目前中译外人才培养的问题, 探寻中译外人才培养的原则与策略。

关键词: 中国文化; 翻译人才培养; 翻译能力; 多要素模式 “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1-0148-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1.027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for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Wu Yu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It is a development trend that China grows to be a more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of cultural plurality. In this historic context, translator training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to showcas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What translation competences should Chinese translators have? W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duce qualified translators? Based on PACTE's multi-component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issues underlying these key questions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for translator training and the effective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or train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ulti-component model “going out”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 日新月异的中国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中国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 如何相应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1年底, 在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被列入“文化强国”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改革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

事实上, “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一命题不仅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建设息息相关, 而且对中国的汉英翻译人才培养提出直接而迫切的要求。目前, 能在海外产生积极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作品几乎都是通过英美出

版机构策划发行、由外国翻译家进行译介的。本土翻译人才的缺失以及中外合作的匮乏更使得中译外这一重要议题处于被动的局面。仅依靠目前有限的译者群体无法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等进行全面、深入地介绍, 也就很难合力为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化价值观, 使得中国文化形象的建立和传播常会不够真实、不够准确。

因此,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需求不断加大, 就需要我们能够形成文化自觉, 能有效培养本土翻译人才, 更好地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那么, 中国文化需要什么样的本土翻译人才来完成对外译介的使命, 他们必须具备哪些必要的翻译能力; 如何从制度法规、课程设置、海外合作等各方面来建构多层次、多要素的翻译能力体系, 提高

*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04)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研究”(13BYY040)的阶段性成果。

中译外人才的培养质量?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外译的现状, 剖析目前中译外人才培养的种种问题, 探寻培养高层次、专业型中译外人才的原则、策略与方法, 以求中国文化得以积极、有效地“走出去”。

2 现状: 对中译外人才的巨大需求

一直以来, 中国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的“译入”与“译出”严重失衡。自清末民初而下, 外国文化, 尤其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作品, 通过大面积、大批量的译介走入中国, 从社会思潮、科学技术、文学理念等各个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 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 我国仍十分重视引进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大量英美文化作品被译为中文, 繁荣并影响着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市场。

相较于“引进来”强大、丰富、多样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状况则显得十分萧条、惨淡, 造成了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明显失衡的状态。“整个 20 世纪西方译介的中国图书只有 1000 多册, 但是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数量却高达 10 万册, 相差 100 倍; 我们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多不胜数, 而输入西方的中国文化的品种却少得可怜, 极不成比例。”(王岳川 2006: 11) 步入新世纪之后, 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但是与之相呼应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却没有得到积极地拓展, “入超”的情况依然非常突出。有统计显示, 中国出版业进出口贸易近年来始终呈现近 10 比 1 的巨大逆差。“2007 年全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进口 2 亿多美元, 累计出口仅有 3700 多万美元; 在版权贸易方面, 2008 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 15776 种, 输出图书版权 2440 种。”(李蓓 卢荣荣 2009: 4)。而影视等其他文化产品的交流与传播也是进口远超过出口。

伴随着巨大文化赤字的, 则是中国文化在外国市场的边缘地位。2011 年, 《中华读书报》曾以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为例, 详细解析了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尴尬处境。“2008 年到 2010 的 3 年间, 美国出版英译汉语文学作品分别为 12.8 和 9 种, 共计 29 种, 其中, 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篇小说仅 19 种, 可谓一少二低三无名: 品种少, 销量低, 且没有什么名气, 几乎无一进入大众视野。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 1 月 11 日的排名显示, 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 288, 502 位, 《玉米》排在第 325, 242 位, 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 排位均在 60 万名之外。以小说类的 3 年内新书计, 10 万位之后的排名, 表明其销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余华的《兄弟》(纸皮精装本) 也排在第 206, 596 位, 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 则排到了第 84, 187 位, 相对同胞们的其他作品而言, 已属非常可观。”(康慨 2011: 4) 虽然 2012 年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世界目光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作家, 但是要改变“引进来”与

“走出去”失衡严重的格局, 建立与国际社会之间平等、双向的文化交流, 则远非易事。

分析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不力的状况, 便可以发现不同层面的多种原因, 比如出版发行的渠道不畅、推广机制的定位失当、域外读者所持的种种“傲慢与偏见”等等。此外, 一个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的痼疾就在于优秀译介人才的缺失。国际译联理事及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坦言, “中译外工作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和实际上存在的人才短缺的矛盾, 而需求和短缺矛盾导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短缺, 是极度短缺”(黄友义 2011: 5)。

仍以文学作品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为例。目前, 能在海外产生一定影响力, 同时保持原著水准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由外国翻译家进行译介的。葛浩文(H. Goldblatt)、蓝诗玲(J. Lovell)、白睿文(M. Berry)、杜博妮(B. McDougall)、安德鲁·琼斯(A. F. Jones) 和凯伦·格南特(K. Gernant) 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翻译家积极译介中国文学, 甚至一度出现“中国小说翻译的繁荣景象”(Heller 2000: A22)。尤其是被夏志清称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 更是译著丰厚; 迄今为止, 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老舍、巴金、苏童、毕飞宇、冯骥才、贾平凹、李锐、刘恒、马波、王朔、虹影等约二十五位作家的 40 余本小说。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曾以“接生婆”、“差不多成了(葛浩文) 一个人的天下”评价其在译坛的贡献。然而, 葛浩文与瑞典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 的努力更是直接将莫言送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

不过, 由于中英语言与文化的巨大差异, 精通中文并从事翻译的海外译者人数极为有限。除此之外, 其它英译作品则多是通过国内的《中国文学》期刊和《熊猫丛书》来完成译介的。自 1951 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办, 1981 年时任《中国文学》主编的杨宪益先生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开始, 国内组织译介并出版了一大批中国作家, 共计 190 余种作品。译者群体仍是以外国翻译家为主, 其中也包括如杨宪益等为数不多的中国翻译家。不过, 正是主要由于翻译人才的严重匮乏, 2001 年, 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 2002 年《中国文学》停刊, 《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出版。此类中国文学主动译出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至今仍在继续。

归根到底, 中国文化能走出去多远, 能否改变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之间巨大的落差, 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中译外人才, 取决于翻译的效果能否成功地对外介绍中国, 帮助世界关注中国、了解中国。这也使得中译外人才培养和翻译能力培训成为一个迫切、重要的命题。

3 问题: 目前中译外人才培养的不足

在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语境中,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国家已经从文化战略的高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积极推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2004年,中国外文局成立“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同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开始着力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的翻译费,每年资助中国图书翻译资金已由2005年的600余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000余万元。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全面开始,重点资助如以文化、文学、科技、国情等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图书的翻译、出版及推广。2010年年初,“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这一系列国家主导的推广措施先后出台,汇集成一股对外翻译、出版日渐发展、走向繁荣的态势,也反映出中国提高自我软实力,构建真实、完整、鲜明的国家形象的强烈愿望。

要将这一系列措施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与融合,关键就在于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甚至可以说,中译外已经成为构建一个国家对外交流能力和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准确、深入、生动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翻译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本土翻译人才来完成对外译介的使命,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换言之,中译外人才需要哪些必要的翻译能力?

目前,社会上多数人“还不能真正从学术角度理解翻译工作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懂外语就能做翻译这一认识上的误区还普遍存在”(黄友义 2011: 5)。对中译外工作的本质了解不够、认识缺失使得翻译能力多被简单地归结于译者的双语转化技能或是专家知识。事实上,语言能力仅仅是翻译能力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合格的翻译人才应该具备的是多模块、多要素的翻译能力与知识体系,或者说,翻译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涵盖了语言技能、百科知识、转换能力、工具技能、策略选择、认知过程和心理特质等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求和素质。在翻译能力研究方面较为权威的PACTE模式是当前较为全面,也广为接受的翻译能力观。对它的解读能让我们对翻译能力的构建形成较为完整的界定和了解。

PACTE模式将翻译能力看作是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共同构建的一个多层次的知识结构。该结构主要包括如下要素:(1)双语次能力(bilingual subcompetence),即在双语交际中必备的程序性知识,包括语用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语境知识、语法和词汇知识。(2)语言外次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主要是陈述性知识,即对世界的普遍认知和具体的专业知识,包括双文化知识、百科

知识和专门领域知识。(3)翻译知识次能力(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subcompetence)。主要是陈述性知识,即翻译及翻译职业知识,包括翻译实践的完成(翻译单位、翻译过程、方法、步骤及问题)、翻译的专业运作(市场、目标读者等),以及翻译协会、关税等其他方面知识。(4)工具次能力(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主要是程序性知识,指的是翻译中运用文献、信息及技术(辞典、百科全书、语法书、文体书、平行文本、语料库、搜索引擎等)的能力。(5)策略次能力(strategic subcompetence),是保证翻译过程顺利有效、妥善解决问题的程序性知识。策略次能力是最为关键的次能力,它连接并影响其他各项次能力,控制了整个翻译过程。它的功能是规划、执行、评估翻译项目,激活并弥补各种次能力,发现翻译问题并解决问题。(Pacte 2008: 106-107)

此外,PACTE模式还包括心理生理要素,即不同的认知类型、态度要素和心理机制。认知类型包括记忆力、感知力、专注力和情感,态度要素包括好奇心、毅力、严谨、批判性精神、自信心、自知之明、动机等,另外还包括创造力、逻辑推理、分析和综合能力等。

除了PACTE翻译能力模式,Campbell(1998),Schaeffner和Adab(2000),Anthony Pym(2003)也先后界定翻译能力,多模块、多要素的翻译能力建构成为各种模式中的主导思想。对照这一在翻译界中取得共识的知识体系,不难发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当前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着如下问题与不足:(1)缺乏对翻译人才遴选的权威机制。“双语次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对翻译人才,尤其对中译外人才的选拔、录用和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事中译外的翻译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外语能力,必须谙熟语言的词汇、语用、语境及文化等特色;如果翻译的是中国的经史子集,还必须具备深厚的中文古文功底。但是目前,“我国对翻译行业人员从业尚没有设置任何刚性的、统一的准入门槛,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翻译工作”(黄友义 2011: 29-30)。虽然自2003年起,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始设立“翻译资格水平考试”,不过这一考试并未在行业内起到“准入资格”的作用,无法像会计、律师、医生等其他职业的认证考试那样树立清晰、严格的遴选标准和程序。“低准入、无准则”的现实使得整个翻译市场充满了大量的“兼职翻译”与“业余翻译”。而诸如译言网(Yeeyan)等网络平台更是汇聚了大量水准不一的翻译爱好者。翻译水平的参差不齐使得翻译行业的运作缺乏系统性、组织性和规范性,也使得翻译人才的培养缺乏有效的引导、定位和实施。(2)缺乏对翻译行业和翻译规范的认知。“翻译知识次能力”要求译者必须充分了解包括出版社、赞助人、目标读者等在内的翻译市场。《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外译之路之所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对于翻译机制里的各个环节

把握不够准确、到位,缺乏开拓主流出版路径、建立经纪人、版权代理商体制等专业意识。主动译出的译者在文学复兴的情结之下,将中国文化的外译转化为一种命题式的硬性推销,使得翻译的传播渠道不畅,译作多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小众类别,通过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很难得到海外主流出版社的认同。此外,“翻译知识次能力”还要求译者能够尊重并遵守翻译运作的流程和规范。但是目前国内还无一个具普遍践行意义的翻译行业准则,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高校翻译专业教学也很少涉及对翻译行业流程的介绍,译者多半以个人行为来运作自己的翻译工作,大多没有形成遵守时限、忠诚客户、尊重翻译中介等基本翻译道德,这样营造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市场环境,无法保证译者的利益和良性生存。(3)专业领域翻译人才匮乏,对人文素质的培养不足。换言之,即译者的“语言外次能力”十分薄弱。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欠缺专业领域知识,一是欠缺百科全书般的人文基础性知识。其根源多在于目前国内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与翻译工作的现实需求脱节。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文化传播跨学科、多元化的性质使得越来越多的中译外工作需要不同的专业领域知识,需要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翻译人员,单纯语言类的翻译任务并不多见。而目前高校的中译外课程设置多以传统的语言文学性翻译为主,多侧重词句、语篇等基本转换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翻译作为架构两种文明、两种文化共性与差异的桥梁,需要广博的知识底蕴和丰厚的人文素养。一部经典的中国文化著作涉及的不只是文学知识,而是往往涵盖如语言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各个文化层面。当前单一化的语言翻译教学体系显然无法满足文化“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需求。(4)忽视对于翻译工具的运用和培训。“工具次能力”作为翻译能力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已经成为区分职业译员和翻译新手的核心指标。美国学者安吉来利(Angelelli)指出,对“当今的译者来说,这些专业性工具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字典”(Angelelli 2009: 37)。网络、电子资源、计算机辅助工具对身处新时代的译者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中译外方面,这些翻译工具的运用会更大幅度、高效率提升目前的翻译质量和翻译速度。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翻译界,对这些工具手段的应用仍远未普及,大多译者仍无法有效地进行网络搜索,不能运用诸如翻译记忆、机器翻译、本地化软件和数据库等翻译工具,对信息作出合理、正确的判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高校翻译教学体系中也鲜有引入数据库、网络资源和各种软件工具,尤其在翻译测试时,仍采取传统的手写答题,对翻译工具的忽视直接导致翻译培训和翻译工作无法与时俱进,保持高效进行。(5)选择和制定翻译策略时,较少考虑对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感受。“策略

次能力”作为翻译能力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直接决定了译本最终能否在海外被积极接受。国内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更为注重忠实于原文本,努力想保留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特征,而较少关注到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感受。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译者曾十分坦诚地说,“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叫大卫·霍克思。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杨宪益 2011: 4)。而对于霍克思的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更是认为,“在我看来西方读者需要这样的帮助。”但是,“当我提出要采用同样的策略时,被我的中国同事否决了。”他们承认,“霍克思的卓越贡献在于,他用精彩的英语向西方读者展示了这一中国的伟大著作。相比之下,我们的译本不过是一个逐字对照的文本”(Yang 1980: 621-622)。杨宪益所采取的是中国译者所普遍认同并接受的翻译策略,而杨宪益夫妇的感叹也正是目前中国译者所遭遇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就销路和影响而言,杨译远远不如霍克斯的译本,这正是因为杨译较少考虑到目标市场的接受程度,所以译本往往欠缺自然通畅的表达美感。这种文学美感的缺失会影响到译本在目标读者中的流通与接受,因此难被认可,这就造成从中国本土输出的作品在大众市场遭受冷遇的现实。相反,采取适度变通的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本规避浓重的民族主义和地域文化标签,走入异域读者心灵,丰富他们的审美感受和人文体验。

以上这些问题和不足,折射出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中,要实践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的翻译人才培养就必须以多模块、多要素的翻译能力体系建构为目标,从多方面、多环节上加以改进,有的放矢地让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文化,学会欣赏差异性的中国文化。

4 建议:力争建构多层面、多要素的翻译能力体系

中国文化要成功地走出去,关键就在于翻译工作的成效如何,在于能否培养大批高质量的中译外人才,构建良好的对外交流和人文建设环境,认知、诠释并传播中国文化的内涵与厚度,与他种文化一起共同建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具体联系中译外人才培养中的种种问题与不足,就需要我们积极调整应对思路,在行业规则的制定、课程体系的建构、译介策略的调整、考核机制的完善等各项环节上加以改进。因此,笔者提出一些建议。

(1) 制定翻译行业的标准与规范,引入市场准入机制。要改变目前“低准入、无准则”的现实,就必须建立具有普遍践行意义的翻译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并设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整体的、统一性的管理。除现有的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翻译服务规范

第一部分——笔译》(2003)、《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2005)、《翻译服务规范第二部分——口译》(2006)这3个只具参考意义的规则之外,还要制定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翻译管理标准,来承担规范从整个翻译行业到各个翻译企业的使命。尤其是要明确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的战略地位和语言规范。具体而言,就是要界定翻译标准,制定有关翻译时限、对象客户、翻译中介、翻译争端等各个环节的道德规范,按重要程度、领域性质拟定不同的翻译规范文件,尤其要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翻译语言和语言翻译的质量要求和安全意识。除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之外,还要引入客观的市场准入机制,在专门机构的统一约束下,进一步落实对翻译行业的规范化管理。

(2) 设置多元化、系统化的翻译课程体系。自2006年开设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以来,翻译学科在国内迅猛发展,综合性大学、外语院校、师范院校、理工院校和研究机构等两百余所各类培养单位均开设了翻译专业,使之成为高校学生的热门之选。而近年来,随着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这一国家战略的提出,中译外人才培养成为各个培养单位健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命题。设置多元化、系统化的翻译课程体系成为实现这一命题的关键步骤。根据PACTE翻译能力模式,课程设置可涵盖4大板块,分别为翻译理论课程、翻译实践课程、翻译知识课程和人文知识课程。理论类课程如中西方翻译史、翻译理论、文化翻译和当代翻译研究等可以训练学生的策略次能力,提升翻译素养;实践类课程如商务翻译、个案研究、翻译工作坊、技术写作、翻译技术、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立足语篇,结合现代翻译工具,可以培养学生的双语次能力、工具次能力和策略次能力;翻译知识类课程如翻译与文化政策、本地化项目管理、翻译项目管理等可以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翻译知识次能力;人文知识类课程如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哲学、历史学,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外次能力。此外,各培养单位还须根据翻译行业的市场需求和要求,立足学校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定位,增加一些特色鲜明的课程,如金融翻译、法律翻译、外交翻译、旅游翻译等,在课程设置多元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符合自身发展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能胜任专门领域翻译工作的翻译人才。

(3) 加强与海外高水平译者的交流。如前文所述,海外汉学家译者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向他们汲取知识成为中译外人才培养的宝贵方法,能够帮助中国本土译者高质量地展开译介活动。近几年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英国艺术委员会、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合作,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英国企鹅出版集团联合承办了几期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专门邀请了葛浩文、蓝诗玲和杜博妮等海外著名译者,也

同时邀请了阎连科和毕飞宇等著名作家,与几十位从事汉译英的中国译者一起交流探讨,通过文学翻译的实例分析帮助本土译者们有效成功地进行翻译。诸如此类的交流和研讨可以在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内举办,以发现并培养更多的译才。还可以由官方和民间等多种渠道举办互访活动,特别是文学交流和研讨活动,加强中外译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译者得以向那些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学习切磋。此外,也可以通过国外研修、科研合作、人员互派、开办中外暑期学校、联合培养等方式,着力打造一定数量的造诣深厚的本土中青年译者,尤其是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翻译团队。

(4) 了解译介各环节,调整译介策略。“策略次能力”作为联动各翻译能力的重要要素,辐射到包括作家、译者及经纪人、版权代理商、出版机构的译介各个环节,因此也成为体现本土译者与海外译者之间最大差异的能力,往往决定了译本的成败。因此必须要使中国本土译者熟悉并参与到出版、推广、译介的良性合作之中,了解国外出版社、评论家乃至目标读者的文学诉求和阅读感受,疏通并及时解决译本在传播和推广过程中的困难,从而适当地调整译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对译介策略的调整并不是一味地削足适履,追随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而是要关注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诠释方式与交流效果。译者一方面要尊重国外的文化习惯和审美诉求,让国外读者能够形成自然、流畅、通达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留中国文学中的陌生感、民族性及其背后所蕴藉的文化基因和审美方式,让读者能够体会并欣赏中国文化独特的美与力量。葛浩文英译的莫言的《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毕飞宇的《玉米》(*Three Sisters*)、白睿文英译的《长恨歌》(*Songs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都是其中成功的范例。这些译作均选取了变通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努力地忠实于原著,保留其中独特的文学个性和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努力地跨越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局限与障碍,使得中文原著中的陌生元素适应西方读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习惯。译者、作者和读者,原文与译本,陌生化与可读性之间的角力在译者的笔下消解为十分和谐的共场。这些译本在译语文化中大都大获好评,使原著的文学生命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延展,也证明了了解译介各环节,适度地调整翻译策略,才能让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建立完善的考核和评估体系。要改变目前鱼龙混杂的翻译从业现状,真正遴选出高质量的中译外人才,就必须建立并实施翻译认证、考核与评估制度。要在已有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和上海市的“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的基础上,衔接欣欣向荣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培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认证与考核体

系,考察包括双语次能力、语言外次能力、翻译知识次能力、工具次能力、策略次能力,甚至心理生理要素在内的各种翻译能力。从中译外人才的考核和评估来看,可以将全国二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作为 MTI 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还可以发挥翻译教育指导委员会、各类翻译行业协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从不同行业领域的翻译要求来检测和监督翻译从业人员的各种翻译能力要素;尤其要注意的是,考核与评估不应将重点放在某一字词的选择是否精准,而且应该检验译文整体的表达是否达到翻译指示的要求,是否准确地运用了相关的翻译策略,是否实现了原文的内容、意旨和观点,是否能够让外语读者解除文化障碍的困惑,达到自然通畅的阅读感受。此外,因为此类考核多为手写答题,无法评估应试者的工具次能力,还应当组建环境去衡量应试者在与真实工作环境中类似的翻译软件、数据库等的运用能力,全面考核翻译人才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6) 汇聚并引导民间力量和海外资源。中译外翻译人才的培养不能局限于政府资助和学校行为,要同时汇聚来自民间的积极力量。在当前网络迅猛发展,瞬息万变的社会里,通过网络汇聚的民间学术机构和人士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推动力量。比如像“纸上共和国”(Paper Republic)这样由海内外的翻译爱好者建立的网络社区正凭着一己之力,发挥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海外开设,诸如“中国文化年”、“世界汉语大会”等文化活动的大力开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文,这些积极的海外资源正日渐成为中译外人才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基地。比如美国翻译协会下属的华语分会就有着数百名从事汉译英工作的海外华人,他们定居美国生活多年,谙熟两种语言,已然形成了一个十分宝贵的海外人才库。对这些民间力量和海外资源的关注、扶植和积极引导必将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推介大有裨益。我们要在国家的政策主

导和体制规划之下,将来自民间、高等院校以及翻译行业的学术力量汇聚一处,抓住发展机遇,立足市场的需求,形成全球化的视野,向海外展示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真实的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黄友义. 中国特色中译外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在第二届中译外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J]. 中国翻译, 2011(6).
- 康 慨. 一少二低三无名: 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N]. 中华读书报, 2011-01-12.
- 李 蓓 卢荣荣. 中国文化走出去 急需迈过翻译坎[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08-14.
- 王岳川. 面对薯片芯片大片 中国文化不能失声[N]. 人民日报, 2006-4-14.
- 杨宪益. 杨宪益对话集: 从《离骚》开始, 翻译整个中国[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 Angelelli, C. Using a Rubric to Assess Translation Ability: Defining the Construct [A]. In C. Angelelli & H. Jacobson (eds.). *Testing and Assessmen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 Heller, S. 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 [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0-9-8.
- Pacte, G. First Results of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xperiment: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and Efficac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 In J. Kearns (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Issues, Methods and Debat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8.
- Yang, G. The Story of the Stone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0(3).

收稿日期: 2013-01-23

【责任编辑 谢 群】

◎由主体和谓词构成的主-谓结构不仅形成词汇意义的两个极性类型,而且形成转喻的各种类型。比如,转喻可以用来证同对象。此时,它大多出现在主体位和其他题元位上。标准隐喻是功能迁移的结果,也就是从证同意义位或者分类意义位向谓词位迁移的结果。然而,即使隐喻的句法位保持不变,其意义也会根据谓词模式进行修正,以便适应谓词位。